本期

WENYIPINGLUN

◎聚焦文学艺术界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厚重的历史性

饱满的情感性

深切的诗性

让儿童文学彰显更加丰厚的民族性

典評

◎张锦贻

（下）

蒙古族作家韩静慧的长篇小说新作《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写草原上的蒙古族女孩宝迪，懂得父亲定要将祖传擀毡工艺传下去的心思，牢记母亲将擀毡工艺做得有条不紊的执著，一切，都满含着亲切的温情、执拗的护爱、稚拙的尊严。于是作品就在祖传手艺不传女孩的氛围里写“丫头片子就是树上的鸟”调动援兵的“鬼丫头”；写破传统学擀毡的过程为“偷艺的快乐”；把不紧不慢地剪羊毛写成“给小羊脱衣裳”，竟把宝迪学擀毡写得如诗如画，把宝迪的执著写得如痴如醉。而这都是因为女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手艺的热爱，对执著学艺的草原女孩宝迪的关爱，对民族手工艺在传承中光大的挚爱。在这深深爱意的抒写中，又自然地写到旧时代草原擀毡匠的屈辱和苦难，也由此写出了蒙古民族发展中的另一面，抵进了民族生存的本质性、民族性格的独特性和审美的深沉性。如此厚重的情感性抒写，自然地深化了儿童文学民族性的蕴涵，也天然地强化了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情致，更显示出情感性融于民族性的艺术生命力。

哈萨克族作家阿瑟穆·小七的连缀散文新作《唯有解忧牧场》，满怀深情地讲述着当下哈萨克牧人家的大人、小孩在新疆阿勒泰解忧牧场上的天然天真、自由自在、开放开心的日子，毫不张扬地描述了生活在牧场上的哈萨克新一代儿童的活泼、朴实、纯真的性情。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今天，“有意思的邻居们”所呈现的这一份真切的赤忱和厚道，“有灵性的动物们”所展现的这一处深沉的忠贞与和美，不仅为女作家所钟情，也为所有人所钟爱。情的共振、心的共鸣，使作品中丰厚、美妙的情感性完完全全地洇漫在此时此地独一无二的儿童文学民族性、地域性之中。更为独特的是，作品中所写的一个个儿童，虽是本民族中最普通、最平常的，却因为女作家讲述的真挚、描述的真诚，使那些普通的、琐碎的细节显现出人性的高贵、童情的稚真，使那些平常微小的细部表现出气度的非凡、童心的圣洁，这当然是各民族人民都珍爱、都喜欢的。如那篇《我只是找我的羊》，写有一天，整天伺候羊群的努尔旦老爷爷丢了一只羊，他发疯似地跑遍周围所有的毡房，无休止地瞅着附近各家的羊圈，寻觅着、唠叨着、诅咒着。各家的人都体谅老努尔旦的心情，都任由他查看。等他走到小别克家，继续说着羊“一定是被人偷走了”的话时，小别克竟认真地拿来自己的大书包，掏出校长授予他为“诚实之星”的奖状、奖品，小别克拽住他的坎肩让他看这些东西直到把他拽倒在草地上。老人“找我的羊”的较真，小孩“绝不偷羊”的认真，让人会心地笑出来，又悟出哈萨克儿童思想情感的高尚和品德行为的高洁。

作品《这把斧子不错》，写小别克父亲在毡房前空地上劈柴，4岁的小别克学父亲，拿一把塑料斧子劈青草。他见父亲累得满身大汗直喘气，自己却不累，就以为自己拿的是一把“魔力斧子”。小别克就把“魔力斧子”借给父亲，好让父亲劈柴时轻松些。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些，把“魔力斧子”踢到几米外的柴火堆里。晚上，小别克认真问起用“魔力斧子”怎样，父亲才认识到儿子的爱，赶紧点起蜡烛找回这把珍贵的“魔力斧子”。一把塑料玩具斧子很轻的，小别克的纯真爱心很重的；一件日常小事一点不起眼，小孩子的圣洁亲情却是美好心灵的根。阿瑟穆·小七抒写的哈萨克儿童的美好心灵，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血脉相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作品中活泼泼的情感性，为发展着的儿童文学民族性注入了艺术的生命力量；儿童文学民族性因民族情愫的滋润、儿童情思的滋养、时代情绪的滋蔓而鲜活永恒、生动永远、美妙永在。小七作品中，对哈萨克儿童小别克的种种讲述和描述，巧妙地昭示哈萨克民族精神的不同方面，也更证明了情感性之于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本质意义，之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意义。

显然，阿瑟穆·小七以其对于本民族儿童心灵从始至终的关注，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避开城市和时尚、隔开喧嚣和浮华，寻找一份宁静，追求一种纯净，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依存，构成一幅幅原始本真、暖彻人心的画卷，表现出哈萨克儿童在旷远、寂寥牧场上的快乐成长，有着难以想象的欢悦，也有着意想不到的艰辛。应该说，小七接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救救孩子”的脉络，赋予其新时代的民族、地域文化的意蕴，也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色彩洇染其中。

三

在好的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文学民族性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它，虽然包含了内容、形式各方面的元素，最终却必定是以饱含民族生活汁液的民族化的儿童文学语言来表达、表现，这样作品中就有一丝丝本民族独有的情味、情韵流淌出来，有一缕缕本民族的气息、气势传播开来，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味儿在，有一种独特的民族品格在。这就自然地形成为民族儿童文学中隽永、优美、雅致、流畅的深切的诗性。凝聚的民族情愫、凝练的儿童情思、凝结的时代情韵，令人体会到儿童文学民族性的所在。

几位民族女作家，从小生长在旷荒故土——宁夏贫瘠的西海固、内蒙古严寒的喀喇沁、新疆遥远的阿勒泰，她们与小说中儿童人物的精神之根皆深深地扎在民族的故土中。这样的人生体验使她们对当代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变动有着自己的判断，他们对民族儿童成长的书写无疑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在当下的民族儿童文学写作中，执着于书写民族故土上儿童的作家愈来愈少。从这一意义上说，她们的创作就具有了某种文学史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在创作中将新一代人的言行举止抒情化、诗意化，使民族儿童快乐成长背后的艰难、艰辛都变得明朗、明亮而充满希望，民族儿童文学中的诗性也就变得更加深沉、更为深切。就这样，马金莲把回族家庭中儿童的向往、心愿写成了一首心怀大志、一往无前而又饱含热泪、无限温情的成长“史诗”。韩静慧则把广袤草原上女孩生命中的“苦”和“难”史诗化，更把女孩承扬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现代文明的进步理念，在学习擀毡中革新关键工艺、创新艺术图案写成一则敬畏祖传、敬重创造而又敢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励志“史诗”。而阿瑟穆·小七的创作又是极为个性化的。她把阿勒泰解忧牧场上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库齐肯奶奶，厚道唠叨而总爱多事的努尔旦爷爷，以及那个天天向上、事事认真的小孩子别克写成一部人与人友爱共处、和睦相助，人与动物友善同存、和美相依的生活“史诗”。

在民族儿童文学仍然薄弱的当下，民族女作家们为我们展示了诗性儿童文学的表达空间到底有多大！她们所写，虽然不是历史变革中的大事件，但她们以犀利和尖锐切割下民族历史特殊时段中那些最富诗性的民族儿童人物和故事，又以机智和灵动放大了这些民族儿童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充满了温馨的抒情意蕴，贯穿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一如那些宏大而广阔的史诗！读她们的新作，令人感受到她们着意于对新一代民族儿童内心世界的逼视与揭示，是对他们人格力量的正视和宣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故事与情感，在心灵之光的烛照下，艺术上熠熠生辉；在人格之力的促动下，思想上冉冉升华。诗性，一经儿童文学民族性的熔铸，就使作品变得更具深度和力度。儿童文学民族性，有了诗性的融入，也就令人感觉到寒暖自知的温度、感触到俯仰自如的高度。深切的诗性，使儿童文学民族性从理论概念中解脱出来，真正显示出它的艺术生命力。

当然，民族女作家的诗性创作不止于此。新人新作的出现是更为重要的。如广西苗族青年女作家杨彩艳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我们的童年谣》，以儿童“我”的视角，写会唱好听歌谣的童年玩伴阿湘和她的一家人——会讲好听故事的阿湘爸、梳着好看长发的阿湘妈、百般宠爱孙子的阿湘爷爷、全家呵护却患了怪病的阿湘弟弟。在杨彩艳平实、平常的书写中，这一家人个个鲜活鲜明、可亲可爱，却个个早病早逝、可怜可悲。作品中，叙述这一家人贫病交迫的悲苦命运，描写乡人迷信巫术的悲凄遭际，铺陈周围世态炎凉的悲切现状，表现“我”负疚自责的悲戚心情，以民族儿童稚真的体验、体察，真切地折射出社会变革中被遮蔽的另一面，反映出有社会责任感的民族女作者的忧患意识。作品以“我们的童年谣”为线索，灵动地将一个个故事片段串连起来，巧妙地使之连贯成一种诗性的表达。诗性的美浸渍了民族村寨的贫穷、落后，在黯淡中透出光亮，忧伤中饱含希望。

民族女作家儿童文学新作，还有如云南丽江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中篇小说《东巴妹妹吉佩儿》、内蒙古达斡尔族作家晶达的中篇小说《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湖南凤凰苗族作家刘萧的短篇小说《三生有幸》，还有如辽宁满族作家王立春的童诗集《梦的门》等等，这些作品中深切的诗性，反映了她们深广的儿童文学情怀，表现出她们作品中深沉的情感容量，以及对民族历史进程的深层思索。

故人何在，烟雨茫茫

——评中篇小说《温凉的时光刀》

◎翠薇

光影

宋潇凌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这个中篇一如时光的刀刃一样既温又凉。

奶奶去世，尤其是一个超过百岁的老人去世，应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悲壮的、隆重的，甚至喜庆的事情。孙子田原也知道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应该到场，必须到场的，他冒着被公司开除的危险，在百忙之中，从京城抽身踏上回家的路途。他要看奶奶最后一眼，他要重新温习一下与奶奶之间曾经拥有的温情。

文中充满了冷幽默，那些媳妇、儿子，对待自己的母亲尖刻、冷酷，读起来让人寒心不已。婆婆与媳妇是天生的冤家，这种关系在这里得到赤裸裸的表现。年轻时候，媳妇折磨老太太也就罢了，而老娘老了，还要给儿子家干活，还要半夜轧草，被无辜的铡掉两个手指；还要被发火的拖拉机拱倒，又压掉三个手指。老人似乎是一个永远旋转的陀螺，一生都不会停止劳动。老人不在乎，老了依然给众多的孙子们烙饼、包饺子、蒸馒头，不遗余力拉扯一堆儿孙长大，奶奶与孙子之间的隔代亲情，又上演得淋漓尽致。

那个日理万机，为了公司上市连轴转的田原，最后的结局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直肠癌晚期。真是应了那句话，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用钱换命，但是还不一定能换回来。生命年限不可预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小麻雀是天上飞的，比人走得更远，当它们吃了美食被网子网住的时候，咋就不知道低低头呢？咋就不知道冷静一下，放低身段从网子下面飞走呢？鸟智商低，没有人聪明，人的大脑沟回里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但人有时候也是犯迷糊，犯低级迷糊。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平常的小病小灾当事儿，身体发出预警信号，无动于衷。一心为了事业，为了上市，为了光荣而美好的前程，为了头顶上的光环，破除一切阻力，前进前进。但是最终的结局常常是事与愿违，事业还没完成，自己的身体先倒下了。

文中各个人物，似乎都是极端的。媳妇仙人是个强势的人，信神信鬼不信医，不管对错，总要自己占个上风。对一双儿女从小不管不顾，自己出去游山玩水，烧香拜佛。母爱的缺失，教育的缺失，亲情的缺失，让女儿离家出走，让儿子夭折，仙人不总结自己身上的错误，她的理论是婆婆的命太硬了，给孩子克死了。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我宁愿相信他们一辈子没有听说过这句话。

我宁可相信作者是写的从前，写的古时候，写的非常偏僻的小村庄，还有那样一部分人，不知道懂得尊重老人，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弟兄之间吵架、打架。其实优良的传统，在他们母亲身上有着生动的体现啊！母亲说，十个指头，咬咬哪个都疼啊。在田原家住了两个月，田原父亲是个好儿子，每天给老人蒸鸡蛋羹，隔三差五炸鱼、煮虾。两个月之后老太太就开始唠叨：别让我吃鸡蛋了，老七家的儿媳妇要生了，我省给她，我省给她。已经100多岁的老母亲，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想到的还是子女，并不是她自己。她这样的“偏心眼”，把唯一一个愿意侍奉她的儿子、儿媳，气病了好几次。

如果她的孩子们，都像老娘一样，不勾心斗角，那么这是一个多么和和睦睦、甜甜美美的大家庭啊！

人心隔肚皮，一个锅里有一粒老鼠屎，一锅汤的味道都坏了，更何况好几粒老鼠屎。奶奶的命就是硬，101岁了，还是没有老死。她饿了，她爬着出去，她爬出门槛，爬出大门，爬到大门口的老槐树底下，晒太阳。让村里路过的一个傻子帮忙，在老槐树上垂下来一根绳子，打成一个节，这才去了，去了另外一个，没有纷争的世界，也没有儿女情长的世界。她走了，她的那些儿女们还活着，还要在人世间尔虞我诈，自我为尊，还要在尘世里挣扎，过自以为是的生活。

小说最后，用了大量篇幅描述田原走出奶奶丧礼现场，到田野里去，在奶奶的坟前躺了一夜，细腻回忆与蛇莓，与荚迷树、荚迷花，与山鸡，与黄精，从前与奶奶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整个作品中，最有温度、温情的部分。“在没有开始亦没有尽头的时光中，生命细碎的悲欢从不曾停止”，作者在竭力说明一个道理，人老了，会被冷落，被嫌弃，被忽略，被鄙夷，但又竭力所能的，视若珍宝的，毫无怨言的，爱着自己的孩子。小说的语言充满了诗意，忍不住让人一口气读完，唏嘘不已，感叹和反思。

立场

影视“多胞胎”——

故事新编还是重复创作？

◎周慧虹

影视“多胞胎”现象俨然近年来一道亮丽的风景。观众见面的有《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山楂树之恋》《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微微一笑很倾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盗墓笔记》《重返20岁》等等。未来的同样有不少，曾在各种颁奖礼上被嘉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已于今年5月开始了电视剧版的拍摄；《悲伤逆流成河》的影视两版作品均已杀青，并分别排期2019年和2018年秋天；而《集结号》《芳华》《红海行动》等电影都有了拍摄电视剧的计划……

这些“影改剧”抑或“剧改影”的“多胞胎”，有些是基于同一IP的“一鸡多吃”，有些是沿用同一框架、套用一个模板的“故事新编”。尽管，相关剧创人员为此付出了一定心血，个别“孪生剧”还被列在了观众期待榜单的前排，然而就目前来看，大多一版不如一版，给人总体印象是失望大于希望。

拿电视剧《合伙人》来说，与5年前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相比，无论是剧中人物，还是剧情、配乐等均相同。影视两版“合伙人”虽然“配方”相同，但因为“时代”这一关键要素的剥离，剧版变了味儿，成了荒腔走板的“伪现实”剧。

由此，不免使人联想到一个成语——刻舟求剑。时代的航船早已驶离了旧时的那片水域，相关剧创人员居然循习旧迹，仍天真地期望能一个猛子扎下去，打捞上来观众的一片赞叹，以及想象当中的真金白银。诚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此看似讨巧实则有悖生活真实的“创作”，只能徒留“槽点”与笑柄。

客观来讲，只要不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借助于既有资源“影改剧”“剧改影”并无不可，不过，如此同题创作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毕竟，先期成品已经在艺术水准上定下了一个“标高”，其内容也早已“剧透”，这种状况下，观众的欣赏预期势必提高，同题创作者想要“出彩”，想要吸引更多观众“二次消费”，除非能够技高一筹，从演员演技、情节铺陈、意境营造、镜头表现等方面精益求精。同时，能够进一步深挖作品内涵，令新编后的影视作品与社会现实、观众诉求更为贴合，使大家在观赏后体味到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方能因对先期作品的超越而征服观众，赢得认同。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题创作的难题甚于原创一部作品，它极大考验着剧创人员的创作态度与才情。所以，相关剧创人员还是要“认识自己”，准备从事同题创作之前，慎重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样的“金钢钻”。若是自我感觉底虚，趁早打“退堂鼓”为好，免得自己受累、观众遭罪，还因此而带坏了影视业发展风潮，影响了行业口碑，无端浪费了社会资源。

当前，影视“多胞胎”现象趋多，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剧创人员“吃老本”“蹭热点”思想严重，但另一方面，亦显现出影视领域原创乏力，优秀剧本仍嫌稀缺。新时代条件下，做大做强影视行业，还需要广大的影视创作者进一步摆正职业操守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认真遵从创作规律，沉下心来瞄准艺术精品，不断付诸坚实努力。